

·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

上帝许给的土地——
闵明我行记和礼仪之争

[西班牙] 闵明我著
[中] 何高济 吴翊楣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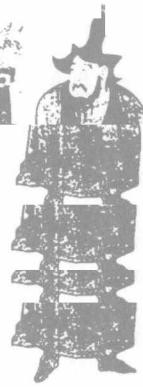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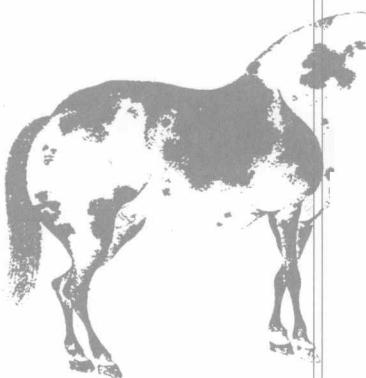
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大象出版社

·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

闵明我行记和礼仪之争
上帝许给的土地——

〔中〕何高济 吴翊楣 译
〔西班牙〕闵明我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许给的土地——闵明我行记和礼仪之争/(西)闵明我著;何高济、吴翊楣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3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ISBN 978 - 7 - 5347 - 5336 - 7

I. 上… II. ①闵…②何… III. ①世界史:近代史—史料—1645 ~ 1670 ②中国—古代史—史料—1645 ~ 1670
IV. K141 K249. 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3751 号

上帝许给的土地——闵明我行记和礼仪之争

责任编辑 王莉娜

责任校对 李建平 孙 波 霍红琴

封面设计 张 帆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制 版 郑州普瑞印刷制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68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总序

任继愈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世界知道中国，不自今日始，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① 文明交流的深度、广度也是近代超过古代。

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文化水平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与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其间也有双方文化水平相当，接触后发生冲突，然后各自吸收有用的，并使它为我所用的情况。这种水平相当的交流，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收到互相融会、双方受益的效果。进入近代，中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不再领先，往往借助外来文化补充自己的不足。明中期，如天文、历算，往往学习西法，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又一个实例。

文化交流、交融、吸收、互补，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学先进的情况下，才可以在交流中采取主动，吸取其可用者为我所用。当国势衰弱、文化停滞、科学落后时，往往在交流

^① 第一次在汉朝，公元1世纪前后，开通了丝绸之路；第二次在唐朝，公元7—8世纪；第三次在明朝，公元14—15世纪；第四次在清末鸦片战争前后，19世纪；第五次在“五四”前后，20世纪初到现在。

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去对外来文化选择的主动权,成为完全被动的接受者。鸦片战争以后,在长达百年的这一段时间里,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有些是我们主动吸收的,也有些是中国所不愿接受的,也有些是被迫引进的。

历史告诉人们,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世界上一个地区出现了经济危机,全世界都会受到震动。文化方面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紧密的程度,却也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趋势。当前文化交流的条件大大超过古代,传递手段之迅捷,古人无法想像。因此,文化交流的责任也远比古代社会沉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负担着 21 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艰巨任务。

为了涵盖古今汉学进展的全面状况,本书系分为三个系列:

- 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翻译);
- 二、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翻译);
- 三、海外汉学研究(著作)。

“汉学”这一名称,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人认同,也有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我们不准备用很多精力界定这个名词,我们只是把过去和现代人们已发表的和正在从事研究的这一类译著汇集起来,总之,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个大范围之内的学术著作。正如“现代新儒家”,这个名字的内容,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标准。因为它属于中国文化这个领域,本书系也将包括这类译著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愿借这个领域,作为联系海内外研究古今中国文化的桥梁,为人类精神文明略尽绵薄之力,我们的初衷就算达到了。

我们这套书系,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类未来负责的心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也向中国展示健康、高品位的世界文化。21 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总结历史成果的时代。我们以科学的良心,如实向世界推进文化交流,我们介绍古代先驱者的业绩,在当代人中,沟通各国文化的精华,展望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只有在健康、光明、理性、科学为主干的文化指引下,人类才可以

避免失误,走向和平。每一个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深知和平的可贵,战争的罪恶。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正直善良的学者,出版这套书系,期望其社会效益不仅限于书斋以内,更寄希望于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泯除非理性的强权暴行,引导社会走向和平、光明的大道。为中华民族积累精神财富,为世界人民增加友谊与理解。



译者的话

多明我会修士多明戈·费尔南德斯·德·纳瓦雷特(Domingo Fernandes de Navarrete)，中文名闵明我，1618年生于西班牙卡斯特罗热里斯(Castrogeris)。1634年入伯纳菲尔(Peñafiel)多明我会修道院，后入瓦拉多利德(Valladolid)的圣巴勃罗(San Pablo)修道院学习；1645年当他27岁时，因菲律宾教区缺乏教士，闵明我自愿前往，并于1648年经墨西哥到达菲律宾，他曾在印第安人中传教，并任马尼拉圣托马斯大学神学教授。

马尼拉的气候令闵明我感到不适应，健康状况日益恶化。遵从医嘱，他打算返回欧洲，但经美洲返回欧洲的航道当时被视为最危险的航道，所以他想取道印度洋，并于1657年离马尼拉到达望加锡。但在这里他没有等到赴欧的船只，同时他缺乏足够远航的物资，对大海也开始感到厌倦。正好有一艘船准备赴澳门，他遂改变计划，决定从澳门进入中国参加当地的多明我修士的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在那里与他们一起度过余生。

在福安传教两年后，闵明我赴杭州。这时北京发生教案，汤若望等教士被拘禁，同时朝廷又命令将外地传教士押送北京。在差人的护送下，闵明我及另几个教士抵达京城，被拘禁在南堂。三个月后，又有命令将一部分教士遣送广州，准备驱逐出境。闵明我和同会修士、方济各会修士及耶稣会士等共二十余人，在广州被囚一处，整整

4年。1667年康熙排除辅政四大臣的干预,开始亲政,传教士的处境也开始好转。虽形式上的拘禁仍未解除,但传教士可自行决定去留。迄至1669年,闵明我以赴马尼拉或罗马向上司汇报为名,私自出走澳门,由一名耶稣会士、意大利人格里马迪(Grimaldi)由澳门至广州冒名顶替,而后闵明我启程赴欧洲,经印度、里斯本、罗马,最后在马德里定居。1677年被任命为圣多明戈大主教,1686年在该岛去世。

闵明我返欧后,在马德里完成了他的巨著《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概述》(*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以下简称《概述》),经过多明我会的审核,于1676年付印。这部全面记录中国的书,在欧洲广泛传播开来,有英、法、德、意等文字译本以及多种缩写本,同时被当做撰写中国史的史料来源。法国文豪伏尔泰在《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中称:“在有关中国的事上没有人(比他)写得更好。”闵明我是儒家思想的赞赏者,书中包含他对《论语》、《明心宝鉴》的西班牙文译文,而且给予这两部著作相当高的评价。

这部庞大的著作分为七个论题,其中第六部分是作者个人行记,一个环游世界的记录,这也正是本书所依据的蓝本。由于闵明我在中国居留了约12年,到过中国许多地方,所以这部分的记述是使人很感兴趣的。正是在中国的行程中,闵明我声称,他认为有足够的理由证明《圣经·申命记》中所称的上帝许给的土地指的就是中国:“因为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美地,那里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里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里不缺食物、应有尽有。那里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闵明我的前辈门多萨,在他的《大中国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中提出,洪水之后,诺亚的子孙们“去寻找一个满意的地方,但没有发现有比这里更富饶温和的地方了,这儿有人类生活所需的一切东西,简直无可匹敌,因它的富饶使他们不得不在这里定居,他们找遍全世界,也再找不到类似这里的了”。门多萨没有到过中国,他的论述仅仅是根据他收集到的消息作出的,而闵明我则有亲

身的经历,那么他的言过其实的论断是否有所依据呢?

我们看到,闵明我在中国的行程,经历了当时中国经济最富庶、景色最美好的地区。从澳门出发,他经漳州、泉州、福州,北上到福安,从福安翻越闽浙交界的山岭(可能是仙霞岭),进入浙江到达金华。他称金华即金花,因为附近一座山产金花而得名。金华产全国最好的米酒,火腿绝不比西、葡两国最好的火腿差。从金华到杭州,途中必定经过富春江,因为他说看见钓台,即严子陵钓鱼台,而且听差人给他讲了光武帝和严光的故事,他称赞严光为世人树立了一个藐视世俗名利的好榜样。杭州城市之繁华、物品之丰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他“发现世上最美之湖,两侧为可爱、青翠的山峰所包围,有许多寺庙、宫殿和庄园,极为悦目”。著名的苏州城,“在景色、贸易和商业方面不次于杭州,仅人口没有那么多”。随后他一路北上,虽未能探访孔子陵墓的所在地曲阜,但也记下了一位到过那里的方济各会修士的描述。其中有一株没有树皮树杈的树,据称孔子青年时在树荫下读书;孔庙之神圣,连鸟兽昆虫都从不进入。亚圣孟子的出生地,闵明我说在赴京城途中亲自到过,“我们进入他的庙宇,走过一个为漂亮、高大的古柏所遮蔽的大院。庙内祭坛上立着这位大师的塑像,前面是一块大碑,上面刻如下金字:‘亚圣孟子’”。

无疑这是一条观光的黄金路线。沿途物产之丰富、品种之繁多、物价之便宜,不时使闵明我发出赞叹。如果他深入中国内地,到那些穷困落后地区看看,他会得出上述的结论吗?不管怎样,闵明我行记仍对他所看到的战乱刚结束的中国社会作出了真实的描述。

1704年丘吉尔兄弟(Awnsham and John Churchill)将闵明我的《概述》英译文收录在他们编辑的“游记和旅行丛书”(*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第一卷第一篇中,但没有提及英译者之名。在该书序言中丘氏称闵明我是有学识、判断力和诚实的人,他的记述或亲见,或者据中国典籍,或者得自可靠的人。英国学者库敏士(J. S. Cummins)将该书第六部分“行记”进行校订后单独出版,收入剑桥大

学 1962 年出版的“哈克鲁特学会丛书”，书名为《多明戈·纳瓦雷特（1618—1686）修士行记和论战》（*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1618—1686*）。目前这个中译本即根据丘吉尔兄弟的编辑本译出，并参考了库敏士的校订本和西班牙文本。除《行记》的正文外，库敏士按叙述上的需要，还从《概述》的其他部分，及闵氏的另外著述中摘引有关文字，插入正文内，这部分文字放在文中以仿宋字体形式标出，并注明摘自何处。其中

T Tratados《概述》；

C Controversies“论战”，即指“礼仪之争”，闵明我的另一著作，仅几章付印，未正式出版；

E Ends《结论》，有关礼仪之争的一份手稿；

R Ratification《批准》，闵明我的一篇文章。

以上文字亦予以译出。

第六部分除作者本人的行记外，还有几篇作者的补记，包括：清军人关的追述；郑成功及其父郑芝龙的事迹；莱托纳《菲律宾纪》的注释；科林《菲律宾耶稣会史》的评论；卫匡国《鞑靼战纪》的评论。这几篇补记的中译文系根据丘吉尔兄弟“游记和旅行丛书”英译本译出。

何高济，2004.5.25



作者致神圣、好奇的读者

毫无疑问的是，从事写作并且有志于借以取得历史家之名的人，首先应该保证和捍卫他打算让人们过目的内容的真实可靠性，否则，理所当然地，他将被冠以小说家的尊号。圣伊西多尔(St. Isidore)如是说：“历史是已发生事件的记录，那些历史上发生的事由此为人所知：之所以称作历史，或者根据所见，或者根据所闻，因为古人只有亲临并目睹所写事件者才撰述历史。”

如果执笔者并非亲临者，或者对所写内容没有充分认识，而仅依靠他人的叙述，不经核查就予以采信，那么他的名声肯定会受损，他作品的真实性也将受到质疑。泰勒士(Thales)在回答“真理和谬误相差多远”这一问题时曾说：“贤者的意见是，相差犹若眼之与耳。”眼见可以放心相信，耳闻则存在不实和疑问。圣杰罗姆(St. Jerome)说：“记述眼见之事，与耳闻之事之间是有区别的，所以眼见之人写的东西更可信。”作为笃信上述原则的人，我决定本书只记载我看到、读到，以及我亲历的事。那种没有在所有情节上都坚持真实性的人都会受到的惩罚是，即使他说真话也没有人相信。对于那些受自己偏好和想象左右，或者企图用虚构和梦想赢得喝彩的人，这是应得到的报应。

不可否认，许多有关大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的虚假情报传入欧洲，熟悉甚至亲自到过那里的传教士们一致同意这一点。我自己的

认识和经验，我的所见和所闻足以让我同意他们的看法，坚持同样的意见；所以我将与这里某些人发表的著作保持安全的距离。

我的计划是先公布从开始到 1669 年，即过去和现在关于中国传教事业中的礼仪之争的材料。这是一个必要和有益的论题，甚至有人认为本书应立即予以付印，因为其中若干观点有助于今后许多问题的讨论，同时也因为它涉及更具体的事。

我不怀疑语言是平淡的，如同一个花费 24 年时间学习那些与欧洲各种语言完全不同的外语的人所作的记述那样，但题目非同寻常，而且极有意义，因此可获得益处和教训，这始终是应达到的目的，圣伊西多尔如是说：“各民族的历史并不妨碍读者从其中得到有益的借鉴，因为许多智者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实的指导。”

许多人从阅读大量历史著作及其他书籍中获得乐趣，这是值得推荐的。*Fasciculus Temporum*^① 一书第 3 页有这样的话：“了解史实是非常有益的，这样我们就能从其善而避其恶。”中国的先贤有同样的教导。我的写作可能会对读者起到类似的作用，这也是我所期望做到的；即使我没有达到目的，但我的努力本身仍是有意义的。

那么，热诚的读者，请您接受我良好的愿望和我的工作成果，并请原谅我的缺失。再见。

① 一部宗教论文集。——译者注。

目 录

译者的话	(001)
作者致神圣、好奇的读者	(001)
第一章 作者的新西班牙之旅	(001)
第二章 墨西哥之旅,在那里的停留,以及前往阿卡普尔科	(010)
第三章 作者在阿卡普尔科的停留,及菲律宾群岛之旅	(017)
第四章 作者在马尼拉的停留	(025)
第五章 这期间我做的观察以及我进行的工作	(035)
第六章 我第二次赴民都洛传教	(050)
第七章 我离开马尼拉,以及望加锡之旅	(060)
第八章 我在望加锡国的停留	(067)
第九章 从望加锡到澳门之旅	(076)
第十章 我在澳门停留,首次进入大中国	(080)
第十一章 继续旅行到福安	(087)
第十二章 我在福安停留,然后前往浙江	(103)
第十三章 我的浙江之旅,在那里停留到迫害时期	(115)
第十四章 我的京城之旅,以及在那里的居留	(126)
第十五章 迫害我们的中国仇敌	(161)

第十六章	我离开广州去澳门	(164)
第十七章	澳门城,其形势、兵力及其他情况	(171)
第十八章	我到马六甲的旅行,及在那里的停留	(184)
第十九章	我从马六甲航行到马德拉斯塔帕坦	(189)
第二十章	我在马德拉斯塔帕坦的停留	(197)
第二十一章	我的果空达之行	(203)
第二十二章	我在果空达的停留,以及赴穆速拉帕坦[马苏里帕坦]之旅	(209)
第二十三章	我在穆速拉帕坦的停留	(215)
第二十四章	我旅行到苏拉特,以及其他异常的事	(219)
第二十五章	我在斯瓦里的停留,再度启程赴法国	(226)
第二十六章	我在马达加斯加,即圣劳伦斯岛的停留	(233)
第二十七章	我离开马达加斯加岛	(238)
第二十八章	我在里斯本停留,以及赴罗马之旅	(247)
第二十九章	再专记鞑靼人的入侵中国	(257)
第三十章	记尼古拉斯一官及其子国姓	(263)
第三十一章	以上记载的补充	(272)
第三十二章	对本卷记述的简短增补	(285)
第三十三章	卫匡国神父《鞑靼战纪》一文的评注	(311)



第一章

作者的新西班牙之旅

我的圣父——圣托马斯(St. Thomas)教导说：只有那些可以永远为人们纪念的大事，才值得记录。“如果不记载值得纪念，并且应传诸后代的大事，是不符合常规的”(Lect. Pin I Rom.)。从我撰写本书起，这番话就令我泄气，尽管如此，那些稀罕新奇的事情仍让我决定提笔，讲述我亲身的见闻。我们的奥莱斯特(Oleaster)曾说：“后人不仅乐于知道他们祖先的业绩，也乐于知道祖先经历的种种危难、灾害等等，尽管这些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而我可以如实说：“我已环游了整个世界，走过了海洋和陆地。”这不是出自通常激励许多人去作这类旅行的好奇心或欲望，而是因为我在马达加斯加岛有太多的余暇。为了消磨时间，我开始遵从《传道书》的忠告——“有空时写作”。

我读过几部刊印的行记，发现其中有些事情平凡琐碎，不值得回顾，也没有什么秘闻，少有可推崇之处。我曾读过一份几个人从韦拉·克鲁斯(Vera Cruz)到墨西哥的旅行报道，其中作者夸大了痛苦、饥饿、寒冷等种种旅行中的困难，以致远远超越了事实的真相；如果在谈一条已知的、常行的和普通的道路时，他都如此任意去描绘，那么当他记述在陌生的，离我们更遥远的地方的旅行时，又将怎样做呢？我不会这样做，也不故作不存在的神秘；我将努力不使读者感到

厌倦，同时也不会去对某些寻常的东西夸大其词。

众所周知，在菲律宾群岛，我们的圣玫瑰大教区有严格的、十分细化的戒律，这促使我离开我的亲友、告别家乡去作一次单调的旅行，两次长途航行，即从西班牙到亚洲的极端。世界的这个大地区，始自那些群岛。就人的天性而言，背井离乡总是一个大挑战，但是在教士眼里全世界都是他们的家园。圣格利哥里·纳兹安祖(Saint Gregory Nazianzus)这样说：“对我而言，所到之处，皆是故乡。”同时圣维克托(St. Victor)的雨果(Hugo)写道：“视故国为乐土的人，是脆弱的；以四海为家的人，是勇敢的；为世界而流放的人，是高尚的。”圣保罗的话在此最适用：“我们在这里没有定居的城市，但我们寻求一处可进入的城。”考虑到我们对上帝的义务，离开亲人和朋友不算一回事。

1646年1月26日，我登上旅程，当时我实际上是瓦拉多利德(Valladolid)声誉卓著的圣格利哥里学院(该学院因传播新知而闻名于世)的教授。此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尽管不缺考验我们的困难。讨论异教徒改宗一书的著者说，身为一个传教士要自我准备和武装，第一件事就是耐心，他说得对。每时每刻都会发生许多惹人烦恼的事，如果没有这种德行，最勇敢和最果决的人也会立即泄气。

第二晚我们在萨拉曼卡(Salamanca)停留。学生们之间发生了冲突，其中一名被杀害。在我看来中国两千年来似乎没有学生死于暴力，尽管中国有三百万学子。

我要称赞中国学生的平和、谦逊和稳重；同时谴责我们欧洲学生的浮躁。情况如此，以致有许多人吃惊地把那些异教徒的优点与我们的人相比较，他们很忠顺和仁义。(C625)^①

在这里我可以记录欧洲学生的粗野和堕落。如果欧洲遵照中国人的做法，很多灾祸是可以避免的。萨拉曼卡的谋杀引起了骚乱，有人逃走，有人藏起来，死者被埋葬，我在牧场的圣母教堂曾见过他。

^① 该段文字系库敏士从闵明我其他著述中的摘录，下同。——译者注

我们在凄风冷雨中旅行了两三天，最后一夜我们唯一的慰藉是得以睡在石头上。2月1日我们从普拉森西亚(Plasencia)出发，当晚住进一家孤独的旅舍，叫做山民客栈。我们在那里遇上一名骑兵，他在旅舍胡作非为，不仅欺负我们，还凌辱店主夫妇。更坏的是，他虐待两个在场的穷小子，因为晚上11时，他们不愿洗脸洗手，他就不顾寒冷的天气，把两人赶出门。这家伙干了不少连野蛮阿拉伯人都干不出来的坏事，简直不可理喻。上帝多少压制了他，否则我和我的同伴都不得安宁。后来又有两个教士走同一条路，他们行李不多，只有够他们去塞维尔(Sevil)的盘缠；他们遇上两个大兵，钱都给抢走了。这些上帝的仆人在赴中国和日本传教前已开始受难。以下我将记述，当我安全地在异教徒中旅行时，我忆及此次行程，思考有关的故事，总之，“人们自己的同胞是敌人”。

我一直喜欢鞑靼和中国的士兵，尽管他们是异教徒，却比我们国家的士兵好得多……我看他们像基督徒和虔诚的绅士，不像异端。中国政府做了种种好事，其一就是他们非常注重打击拦路抢劫的盗匪。某地一有盗贼情报，消息立即传至附近村镇，再传至省城，如京城认为有必要，马上派出军队尽力去平叛，不获全胜绝不收兵。正如圣托马斯所说，这是执政者应负的责任。
(T 13;29)

渡瓜迪亚纳(Guadiana)河的时候，我们遇到两名船夫，均佩戴剑和枪，他们先是说免费摆渡，不过渡到半途，他们改口说，人可以免费，但牲口每头要付一个艾特(Eight)^①。他们蛮不讲理，我们只得依靠于恳求和眼泪，上帝因此软化了他们的心，他们最终同意每头牲口收半个艾特。在维拉努伐(Villanueva)没有人愿意留宿我们，因为他们受到兵士的控制。但在中国，有个傍晚，我与许多旅客一起到达一个没有旅店的村子，其中有一家的主人拒绝了自己的同胞，却接待了我和我的三名仆人。这令我忆及在维拉努伐的遭遇，比较一下这两

^① 刻有8R的西班牙银币。——译者注